

译文世界史丛书

LUTHER

马丁·路德

〔英〕迈克尔·马莱特著

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译文世界史丛

LUTHER

马丁·路德

[英]迈克尔·马莱特著
王慧芬译 赵立行校

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马丁·路德/(英)马莱特(Mullett, M.)著;王慧芬译. —上海:上海译文出版社, 2001.1

(译文世界史丛书)

书名原文:Luther

ISBN 7-5327-2484-0

I. 马... II. ①马...②王... III. 马丁·路德, M. (1483~1546)-生平事迹 IV. B979.951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43418 号

马丁·路德

[英]迈克尔·马莱特 著

王慧芬 译

赵立行 校

世纪出版集团

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上海长阳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960 1/32 印张 3 插页 2 字数 46,000

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0,001—6,000 册

ISBN 7-5327-2484-0/K·078

定价: 6.70 元

历史：与人类记忆相衔接

——“译文世界史丛书”总序

顾晓鸣

我在1989年左右主持翻译过一套“社会科学概念丛书”，十几万字一本，近20种。聚焦于人类社会和当今世事最关键却又最众说纷纭的概念，如《民主》、《自由》、《财产》、《种族和族类》、《科僚制》等，对世界上的研究成果作要言不繁的综述，貌似通俗，但理论含量达到专著水平，前沿信息超过正规大学的教科书。普通上班族和大学生读来，分析能力骤然提高。究其原因，知这套丛书系英国开放大学专为开放教育和终身教育编辑。如今见到这套“译文世界史丛书”，顿有老友重逢之感，同样出自英国大学之手的这套书，不足十万字一本，聚焦于人类历史上一个个“最关键的人物、事件、制度”，娓娓道来，讲故事似地一以贯之。细心揣摩，发觉小书一本，五脏俱全；术语有原文匹配，定义阐释得当，史料专门排出，表图一目了然，加上参考书目，添列其后。这架式无疑又是一

种“开放大学”读本，融修身怡情和研读学习于一体，是英国人及其学者人文精神和科学态度之绝妙显示。读这类书，方知“现代化”社会不媚俗不媚雅的“大众读物”该是何种模样。

英国作为资本主义革命的先驱和工业革命的发源地，有着广泛而坚实的工人阶级基础。因此，普通上班族的业余学习和全民的开放性大学教育尤其发达（正在实施全国统一联网，向全民开放远程教育）。就如原为士绅专利的“爵士”称号已授予平民一样，精英的知识正切实地采取独创而有效的方式，“授”予普通劳动者。

一本小书，其中包含的“阅读的革命”，我们不要小觑了！

“译文世界史丛书”的选题结构和文体都是非常独到的，她对于历史阅读和写作的意义更是值得关注。

20世纪末已露历史热的迹象：包括《角斗士》、《伊丽莎白》、《雍正皇帝》、《太平天国》在内的红极一时的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影视和文学作品，以及诸如《还珠格格》那种恋昔的“传记”和“回忆录”借历史人物场景演现代戏的收视率创新高的通俗作品，更不必说大量怀旧的读物充斥书市……历史事实上正成为全世界著作界和读书界的最爱。

被中学教学和教条式的历史著作坏了心情和阅读欲的广大读者，在另一种历史书籍中发现了历史的价值和魅力。

但是，那些滥情甚至滥写的“历史文艺”和某些同样

滥情甚至滥写的“历史自述”，有可能使“历史热”面目全非，因为我们跑遍全市书店竟找不到一本正经八百叙述“长征”之类本国历史重大事件的著作。真正雅俗共赏的严肃历史读物在此间已寥若晨星。

如今，在你的面前，“译文世界史丛书”推出了一种如罗兰·巴特所说的既可读又可写的历史读物。可读，有一定文化程度的读者都可以无障碍地读下来，津津有味。可写，有历史研究兴趣的读者在其中品味晚近研究成果，可以在其基础上作延伸的思考和探索。

这是“译文世界史丛书”传递给我们的新世纪的信息：作为阅读主体和世界主人的普通读者，正经历教育、学习和阅读的革命，步入大学和研究院的殿堂。后现代社会也罢，知识经济时代也罢，网络时代也罢，其重要的标志是作者和读者，知识的创作者和知识的接受者之界限打破，作者和读者平起平坐，相得益彰。因此，这类面向普通人的、深入浅出的“准学术”读物，将会大量出现，它们合乎全民大学习，个人终身教育的大趋势，也合乎专门博览各科的通才培养和素质教育的大环境。我之所以把“社会科学概念丛书”与“译文世界史丛书”相提并论，一方面在于它俩都出自英国学者之手，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，祈盼国内有更多的出版社从方方面面问题，形形色色学科入手来做这样的提高普通劳动者文化水准的学术工作，而不要让“热门”和“炒作”乱了自己方寸，倒了百姓胃口；不要使“书市”“书城”太有书摊味和小报相。当然，曲“高”和寡的学术著作也要通过这类著作的编撰，与广

大人民群众见面。这是一种更为深刻的现代学术民主和大家风范。

这套书毕竟是历史读物,然而它还不仅仅是与诸多学科并列的一科。恩格斯说过,他只知道一门科学,这就是历史科学。历史是人的存在的见证,是人的经验结晶,是一切科学由此发生发展的最大的“孵化器”。别的不说,如今订规划,做管理,都讲究 Vision。这个词台湾学者译为“愿景”,已在大陆通用,其实在史学中也为“异象”,即与众不同的眼界。这种 Vision 来自什么地方?当然,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概念和理论修养的人,可以借助理性的推导,产生对未来社会和市场的预见,但后现代科学的思路却告诉我们,真正另辟蹊径,出人不意的 Vision,只能产生于历史的库藏,就如今日新药的开发和新的药理的发现,需要在以往的、古代的甚至原始的“单方”里寻找线索一样。

史学名家柯林沃德(1889—1943)有一段名言说:要认识自己,就要认识到自己能做什么;但人无法知道自己能做什么,除非曾经做过;因此,知道自己能做什么的唯一线索,就是别人已经做过的事。

历史是什么?是故事,过去的事,用文本告诉你的“别人曾经做过的事”。英文中的历史(history)和故事(story)也是同词根的,这种与可以无穷复制的信息相对应的,独一无二的历史故事,这种与统计和公式相对应的符合人文思路的叙述描写,这种与逻辑和推理相对应的活生生的事件,是血与汗的经验,是知识的本真。

在这种态势中,这套“译文世界史丛书”切切实实地为我们提供了世界史,主要偏重于欧洲史的详尽知识材料:历史人物如亚历山大大帝、路易十四、彼得大帝等,无不与其相关的思潮、政制、事件、时代,联系交融相互发明;而历史事件,则取不同层面不同角度的视野,具体而界限分明,如宪章运动等等;取宏论精如“雅典民主制”等;追根寻源如“一次大战起源”等;还有跨度更大的题目,如复辟期的英国、“冷战”,甚至某一朝代的穷人问题之类。通过这种立体的交汇,犹如多重的神奇灯光使史学之神克利奥现出真相。具体一本书的不足或偏颇,通过这种相互匹配,得到弥补。

在内部结构方面,这套书根据不同题目,多样而统一,并吸收了近半个世纪以来史学史和历史书写的成果,以叙述体为主,辅之以各种有利于展示历史面貌的不同文体和表达手段。以《雅典的民主》为例,这本书对作为西方民主制的渊源之一的古希腊民主,按时间顺序作详尽的历史论述。由此,抽象变为具体,读者对人云亦云失之泛泛而谈的“民主制”的印象和理解,变得具体而强烈,知道了梭伦等一系列重要历史人物及其事迹,了解了阿瑞奥帕戈斯会议等一系列重要组织,弄清了“公民权”等一系列重要概念,懂得了“陶片流放制度”等一系列重要制度,掌握了“将军”、“行政官员”、“屯垦区和殖民地”等一系列具有特定涵义的历史名词。书中的各种地图,雅典四大财产等级的简略适当的列表,某一时期地方编制的详尽个案,以及雅典大事年表和包括古代文献在内的

丰富的参考书目,使这样一本篇幅不大的著作蕴含丰富而扎实的史学内容。专业的和非专业的普通读者在阅读和使用时,一定兴味浓浓,益处多多。中国史以前也出过“历史小丛书”之类,但失之于将“普及”理解为“简单”,如能受此启发,推陈出新,编出有中国特色的、包含更多非西方国家内容的新的“历史小丛书”,定能别开一番生面。

正是这样的历史故事,抵御了世界的一级化、社会的单一化、人生的平面化、文化的霸道化。过度的理性和智商、定律和规则,是世界单调之渊薮。后现代对现代的抗拒,其中一条,就是冲破“逻各斯”的霸权,在人类无限丰富的历史中,在各民族的文化中寻找知识和道德的源泉。所谓“后卫风格”(“前卫”、“先锋派”的对应词),就是与“现代”和“传统”保持等距离。我们可以简单概括为:人的全面知识 = 科学知识 + 历史知识。历史是栩栩如生的,本丛书所选的各书都证明了这一点,这种直观的直觉的经验性又是图像化时代的最瑰丽的图像,在新的世纪,将有无数的人物和故事进入影视、绘画、音乐、文学和历史胜地、主题公园、家庭装潢和收藏,成为今日每一个人的生活和存在的一部分。历史故事亲证和亲历的案例性,又将使之进入法律、经济、金融、管理等实践领域,成为印证理论,寻找契机的创意库;最激进的未来学家已经预言人类社会正从第四种形态即“信息社会”进入第五种形态——梦想和故事的社会,21世纪人类的家园,包括饭店、百货公司、街区都将“故事化”,而历史凝聚着我们

父辈和邻人劳作和奋斗的一切,是我们眼下生活着的世界的“故事”源泉。

用历史和故事来阐述哲理,解析法律,驾驭经济、管理,推进改革……一句话,来影响和促进全社会和每个个人的生活和福祉,将成为新世纪的著述盛况。

历史和故事溢出书本,流布世间,凝为建筑和公园、街市和家居,将成为今日文化的最大景观。

所以,一个雄辩得无需强词夺理的结论:一切渴望生命和生活的多样化和丰富性的人们,一切企盼事业和人生的创造性和成功的人们,都应该热爱历史。

用什么方式把历史的片断镶接起来,重现人类的记忆,使之衔接成为具有人类智慧的个体智者?

这是一种纵向的互联网,这也是历史在互联网时代的历史命运。

前言

首先,我们必须知道 16 世纪“宗教改革”的重要性为何,今日或许其影响已经不再明显,但是有些历史学者认为宗教改革建立了思考人与上帝关系的新途径,另一方面又启迪了新思潮,影响到现代资本主义和民主的产生。对于宗教改革的发源地——德国——而言,改革所带来宗教上的不统一,也使得这个国家政治上分崩离析的状态一直持续到 19 世纪。在欧洲,宗教改革大致引发了三次现代初期的大冲突:16 世纪 60 年代至 90 年代的法国宗教战争,16 世纪 60 年代至 17 世纪 40 年代的尼德兰反抗西班牙战争,以及 1618 年至 1648 年的三十年战争。欧洲人之间对于宗教改革也有各种不同的评价,有些人认为宗教改革促进了现代初期欧洲的科学发现,但是另外却有人认为宗教改革助长了 16 世纪和 17 世纪的“女巫迫害”。无论这些评价是正面的,还是负面的,宗教改革都必须被视为欧

洲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。

宗教改革运动包括了天主教内部的改革和“激进”的新教改革,其中新教改革还可再细分为路德教派、茨温利教派和加尔文教派。路德派的改革爆发于16世纪20年代,自16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,许多德国的城市以及分裂成许多各自独立的小领地,正式改信路德新教。除德国之外,路德新教也很成功地移植到斯堪的纳维亚地区,包括现在的丹麦、芬兰、冰岛、挪威和瑞典。瑞士苏黎世的茨温利,大约与德国路德派改革同时,也在16世纪20年代初期发动宗教改革,使得新教普及瑞士邦联的大部分地区。附近的日内瓦,法国人约翰·加尔文在16世纪40年代首先成为宗教改革的表率,并且广泛地传播出去,为法国、尼德兰、苏格兰、英格兰等地所尊崇仿效。茨温利派及加尔文派的改革之所以能够落地生根,一部分要归功于路德派改革运动披荆斩棘,挑战天主教的权威,为后来者铺路。我们可以说,路德派改革在16世纪的宗教改革中是最重要的,也是最及时的。加尔文特别了解路德的重要性,他将马丁·路德视为最好的宗教导师。德国路德派的改革——宗教改革最主要的部分——正是本书探讨的核心。

如果我们已经了解到路德派改革的重要性,接下来我们应该要认识马丁·路德在这次改革中的地位。

历史学者常常喜欢去问这样的问题：在某个历史过程中，个别的人究竟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。以马丁·路德和路德派改革为例，由于路德对自己所扮演的角色过于谦虚，所以引起了路德历史定位的混淆与争议。路德不称自己的改革为“路德派”改革，他认为自己的改革奠基在《福音书》之上，所以宁愿称为“福音派”改革。路德这样描述自己：“我从未改变什么……是上帝的话语改变了一切。”他在这里希望强调的是在那个时代发生的大事件中，上帝所扮演的角色。然而，历史学家可能会强调下列因素对于路德派改革的重要性：16 世纪初天主教教会在德国和欧洲所处的地位，德国的社会、政治情形，一同推动改革的伙伴，例如菲立普·梅兰希通对于路德的帮助，还有近代发明的印刷术，使得路德的改革信息可以大量传播。我们会把这些因素都考虑到，但是历史学家仍然必须认识到马丁·路德个人非凡的作用。为了要降低自己的重要性——因为“是上帝的话语改变了一切”——路德又说：“我只是教导、祈祷和写作而已……。”但是他没有告诉大家，他传教的方式是了解人类救赎最有力、最简单的概念；他祈祷的方式，利用世上独一无二的力量，真诚、朴实、不拘泥礼节；他的著作在现代图书馆中可以放满一英尺见方的空间，他的作品光是现代美国版就超过 50 种。现代的印刷术当然有助于书本的出版流通，但是马丁·路德的

笔才是最大的功臣。在这段导言之末,我们要说“路德派宗教改革”这个词语很适当,它提示了路德在这次运动中的重要性。接下来,我们要将场景转到中古晚期的德国和欧洲,看看那时候宗教与人们信仰的情形。

目 录

前 言	1
第一章 教会与宗教	1
第二章 宗教改革前德国的社会与政治	14
第三章 路德:早年时期	22
第四章 从修士到叛逆(1505—1517)	30
第五章 路德与教廷(1517—1520)	42
第六章 路德与神圣罗马帝国(1521—1525)	53
第七章 路德与德国的宗教改革(1525—1546)	63
参考书目	75

第 一 章

教会与宗教

罗马教皇是世界上所有基督教会领袖,对于信徒而言,他就是基督的代理者。12 世纪及 13 世纪初期是历史上教皇权力最大之时,尤其是英诺森三世任内,当此之时教皇主导着促进基督教会改革与更新的动力。中古世纪的教会是个非常庞大的组织,理论上包括了西欧的所有民族。教会的道德性格,其实就是由这些基督教徒的道德性格所组成,不论是圣徒还是罪人,其道德性格都包含在内。中古时代的人确实总是有着改革上的需要,而改革意味着回到基督和十二使徒创建基督教时的原始情形,凡有从事改革的教皇,通常会保证教会做好工作;尤其是经由在教皇英诺

森直接保护之下建立的圣方济各会便是一个极成功的例子。他们明显地在模仿基督与十二使徒完全守贫的生活。然而,至少从 13 世纪末开始,我们可以观察到教皇的道德热情与改革宽容力日渐衰弱,教皇和世俗君主间的长期斗争一直是中古时代教廷历史的主题,并伴随着教会法和教会财产越来越深的牵掣纠葛而持续进行着。

为了摆脱罗马和意大利的政治问题,教皇在 1309 年将教廷迁移到阿维农,深受法国影响。14 世纪时的教皇多半居住在法国的一个地方小镇,而非有着悠久传统的“圣彼得之城”——罗马。1378 年,想要将教廷迁回罗马的意图造成“教会大分裂”,两个对立的教皇(罗马、阿维农)彼此罢黜了对方的职位。这种荒谬的情形到了 1414 年在德国的康士坦斯所举行的基督教大会上才得以解决,会议中将两位教皇强制开除,1417 年选出了新教皇马丁五世。教皇及整个教会的声望皆受教会大分裂的影响而严重受损,锡耶那圣洁的凯萨琳提出严厉的批评,这是属于基督教内部的声音;比较令人担忧的是,这次教会的危机让英格兰的约翰·威克里夫(1384 年去世)破坏性的异端思想获得了听众,也为波希米亚(今日的捷克)的约翰·胡司(1415 年去世)那种尖锐的批判和改革思想招徕听众。教会大分裂事件落幕之后,虽然教皇恢复了一些早先的名望,然而教